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

北京文化通讯

2013年第8、9期合刊
（总第15期）

本期要目

政策导览
■文化部出台《网络文化经营单位内容自审管理办法》
■中宣部等五部门要求：制止豪华铺张，提倡节俭办晚会
动态关注
■生态文明贵阳论坛2013年年会闭幕
■网络名人社会责任论坛在北京举行
媒体聚焦
■打击网络谣言，更要反思网络谣言的滋生土壤
■冀宝斋折射出民间博物馆乱象与困境
尖峰观点
■彭真怀：要真正理解新型城镇化的切入点
■伍江：中国城镇化的问题与解决之途
海外视野
■英国为什么能够成功出口戏剧
研究院之声
■我院学者参加亚洲文化研究协会2013年年会
■我院召开“中国传统文化与社区建设”学术座谈会

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
Institute for Cultural Studies,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1. 政策导览

(1)政策文件

■ 文化部出台《网络文化经营单位内容自审管理办法》

近日，文化部出台了《网络文化经营单位内容自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要求，网络文化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内容审核制度，对拟上网运营的文化产品及服务内容进行事前审核，确保文化产品及服务内容的合法性。

《办法》的出台，将使原来主要由政府部门承担的网络文化产品内容审核和管理责任更多地移交给企业承担，这不仅能够强化企业自我约束机制、提升企业自我管理能力，也加强了政府对企业的后续监管力度，从而使文化产品和企业服务内容的合法性得到保障。

《办法》规定，网络文化产品及服务的内容审核工作，由取得《内容审核人员证书》的人员实施。内容审核人员由各省级文化行政部门组织培训考核。《办法》要求企业保障内容审核人员的独立表达权，同时也明确了其承担的责任，对于玩忽职守造成严重社会影响或者出现重大审核失误的，将由发证部门注销其《内容审核人员证书》。文化部在通知中指出，参与《内容审核人员证书》培训的人数由各企业根据实际需要确定，培训工作也可交由行业协会等社会中介组织承办。目前，文化部正在积极组织编写相关的网络文化管理培训教材，指导制定《网络音乐内容审核工作指引》、《网络游戏内容审核工作指引》等操作手册，以期通过建立成熟、完善的培训师资库和题库，为各地网络文化经营单位内容自审工作及管理培训工作提供有效服务。

为确保《办法》顺利实施，文化部将首先在网络音乐、移动游戏行业实行自审管理，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再扩大自审范围，逐步减少政府审查事项，降低审查层级，提高工作效率。

（据《中国文化报》摘编，2013 年 8 月 21 日）

■ 中宣部等五部门要求：制止豪华铺张，提倡节俭办晚会

日前，中宣部、财政部、文化部、审计署、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制止豪华铺张，提倡节俭办晚会。

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切实规范文艺晚会，要使铺张浪费现象得到明显扭转。要坚持少而精的原则，切实在丰富思想内涵、引领价值追求、增强文化底蕴上下功夫，提倡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提倡简朴大方、反对豪华奢侈，提倡因地制宜、反对大操大办，防止拼明星、比阔气、讲排场。

通知要求，严格控制党政机关举办文艺晚会。不得使用财政资金高价请演艺人员，

不得使用国有企业资金高价捧“明星”、“大腕”。原则上不得使用财政资金为公祭、旅游、历史文化、特色物产、行政区划变更、工程奠基或竣工等节庆活动举办文艺晚会。不得与企业联名举办文艺晚会和节庆演出。不得利用行政权力向下级事业单位、企业以及个人摊派所需经费。中央和国家机关及其所属机关、事业单位等原则上不得与地方联合举办文艺晚会和节庆演出。

通知强调，新闻媒体要大力宣传勤俭节约的精神，加强舆论监督，对漫天要价、大操大办等歪风邪气予以曝光，对未按程序报经批准的文艺晚会和节庆演出，各级新闻媒体不得安排播出和宣传报道。

通知要求，各级部门要加强对文艺晚会的监督检查。要加强资金管理，规范支出，压缩不必要的开支。不得借举办晚会之机发放礼品、贵重纪念品，防止利用晚会为单位和个人谋取私利。要加大财务监督力度，严格落实审计制度，依法对文艺晚会和节庆演出进行审计。对违反本通知规定、耗资巨大、奢华浪费的，要严肃查处。

（据新华网摘编，2013 年 8 月 14 日）

■ 文化部出台《地方戏曲剧种保护与扶持计划实施方案》

文化部日前出台《地方戏曲剧种保护与扶持计划实施方案》，《方案》提出的主要措施有以下几点。

确定全国地方戏创作演出重点院团，以重点院团的扶持促进地方戏曲剧种的保护，各省级文化行政部门应确定本地 1 至 2 个全国地方戏创作演出重点院团（含转制、民营及其他社会力量举办的各种体制地方戏曲院团）并报文化部。

对全国地方戏创作演出重点院团的剧目创作给予资助，以剧目的扶持促进地方戏曲剧种的保护，2013 年，首批资助 40 台左右优秀地方戏剧目，2014 年至 2017 年每年资助 10 台左右优秀地方戏剧目。

对全国地方戏创作演出重点院团的表演及创作人才进行培训，并鼓励各省采取多种方式完善地方戏曲人才梯队建设，文化部将对全国地方戏创作演出重点院团的定向招生或委托培养项目给予资助，分年度开展全国地方戏曲编剧、导演、作曲、舞美人才培训班，并对突出的地方戏曲人才培训项目进行资助。

支持各地对本地最具代表性的地方戏曲剧种的史料进行抢救、保存，要通过文字、图片、影像等方式，加大对现存史料的挖掘、抢救和保护力度。

为保障扶持资金专款专用，文化部将与受资助单位签订资助协议，并对资金使用进行监督和管理。同时，文化部规定各省级文化行政部门要对全国地方戏创作演出重点院团及省级重点院团给予资金扶持，并确保资金使用效益。

（据《中国文化报》摘编，2013 年 7 月 25 日）

(2)政策解读

■ 烧钱办晚会禁令频出，制度建设才是治本之策

8 月 13 日，中宣部、财政部、文化部、审计署、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制止豪华铺张，提倡节俭办晚会。仔细阅读通知内容，此次提倡节俭办晚会的重点在于，不得使用“财政资金”举办“营业性”文艺晚会，不得使用“财政资金”高价请演艺人员，更不得使用“国有企业资金”高价捧“明星”。纯商业演出不在此列。

中央党校教授林喆告诉记者，地方政府办晚会的费用，一般来自地方财政中宣传教育、工会、妇联等部门的工作经费，过去认为这部分支出是理所当然的，并没有把它当成一个问题。但是，2000 年以来全国各地的纪念活动频繁，其中有些甚至办得很豪华。办一台晚会，规模小点的也得花几十万元，稍微大一点就得花几百万元、上千万元，特别大型的花几个亿的也有。明星、舞台背景、灯光是晚会最耗钱的部分；有政府背景的晚会占相当比例。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扩大影响而办的晚会近几年比较多。一般的商演都很少赚钱，更别提这种有政府背景的晚会了。这些晚会的主要功能是扩大影响力。

其实，这并不是今年第一个对烧钱办晚会行为的严控令。今年 1 月 31 日，国家广电总局就下发了《关于节俭安全办节目的通知》，要求各级电台电视台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八项规定”和“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要求，节俭安全办好节日广播电视节目。本刊记者还了解到，早在 2005 年，文化部就发布了《关于贯彻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的通知》，其中指出“禁止以政府名义举办营业性演出，有利于抑制公款追星，维护政府形象”。此后，关于节俭办晚会的通知和意见更是频频出台。

林喆告诉本刊记者，地方政府办晚会所用的宣传教育、工会、妇联等部门的所谓“工作经费”都是列入财政预算的，但是这些列入财政预算的钱应当怎么花，却没有十分严格的规定。她认为，这与“三公经费”的管理是一样的，需要建立制度、严格把关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毛程连认为，今年“节俭办晚会”的通知更多是一种常态化的管理，在各方面制度建设有待进一步完善的情况下，对财政资金进行常态化的管理无疑也是有意义的，“就像一间屋子，你不能因为它总会落上灰尘而不去打扫”。

（据《瞭望》新闻周刊摘编，2013 年第 35 期）

■ 关于中央文化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有关政策的解读

近日，财政部印发了《财政部关于加强中央文化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和《中央文化企业国有产权交易操作规则》(以下简称《规则》)，并就政策所涉及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解读。

《通知》明确了中央文化企业产权转让的原则、管理主体、审批程序、协议和进场的有关要求、收益上缴和监督管理等内容。《规则》主要涉及受理转让申请、发布转让信息、登记受让意向、组织交易签约、结算交易资金、出具交易凭证、争议处理和法律责任等内容。

《通知》明确了分级审批的主体，即“财政部依法决定或批准中央文化企业的国有产权转让，中央文化企业决定其子企业的国有产权转让”。《通知》最终确定“由中央文化企业直接管理和控制，资产总额和利润总额占本企业比例超过 30% 的子企业”作为重要子企业。

按中宣发〔2011〕49 号第五条要求，《办法》规定中央文化企业国有产权在上海和深圳两个文化产权交易所交易。根据财政部、国资委《关于印发 < 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暂行办法 > 的通知》的规定，国有资本收益包括国有产权转让收入，即转让国有产权、股权(股份)获得的收入。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应当按规定直接上交中央财政，纳入中央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管理。《通知》中对产权转让收益上交中央财政的适用对象为中央文化企业本级，中央文化企业子企业及以下企业的产权转让收益归其上一级企业所有。

（据中国政府门户网站摘编，2013 年 7 月 23 日）

2. 动态关注

■ 文化部召开文化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6 月 27 日，文化部在京召开文化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会上，文化部部长、文化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武指出，下一阶段，要坚决落实文化体制改革的新思路新举措。重点工作包括进一步深化国有文艺院团体制改革；深化经营性文化单位改革；积极培育文化市场、深化综合执法改革；分类推进文化事业单位改革；加快转变文化行政部门的职能；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能力；推动文化产业健康快速发展；加强对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引导；发展对外文化交流和贸易等。

蔡武强调，文化体制改革已经进入了全新阶段，要进一步完善文化系统文化体制改革工作各级领导小组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加强督促检查，确保每一项重点工作都有规划、有布置、有考核、有检查、有反馈。

（据《中国文化报》摘编，2013 年 6 月 28 日）

■ 生态文明贵阳论坛 2013 年年会闭幕

7 月 21 日，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 2013 年年会闭幕，会议正式通过“2013 贵阳共识”。与会者认为，生态文明同国际上倡导的可持续发展是相通的。面对能源、资源危机和气候变暖、环境破坏，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不能独善其身，都应顺应历史潮流，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履行共同但有区别的义务。会议建议，把生态文明建设的议

题纳入联合国后2015的发展议程，深入开展生态文明领域的交流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促进可持续发展。

会议认为，当前，应围绕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的总要求，重点采取以下四个方面的政策举措：加快绿色发展和产业转型；推进社会和谐和包容性发展；采取最严格的措施修复自然生态和治理环境；普及以生态为导向的价值取向。

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是我国以生态文明为主题的国家级论坛。本次年会主题为“建设生态文明：绿色变革与转型——绿色产业、绿色城镇和绿色消费引领可持续发展”。据悉，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将永久落户贵阳。

（据新华网摘编，2013年7月22日）

■ 旅游型城镇化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

2013年7月18日，旅游型城镇化高峰论坛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隆重举行。在“新型城镇化”的战略机遇下，本次论坛将旅游行业及相关领域的精英们汇聚一堂，共同探讨“旅游型城镇化”道路。专家们分析了当前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未来的发展形势，解读了“新型城镇化”战略，共同探讨和展望了旅游型城镇化的发展可行性、可实现路径及发展前景。

北京大学吴必虎教授强调城市化并不意味着消灭乡村，必须引入多途径城市化和乡村多途径现代化。刘建华先生则从文化生态哲学的角度去思考中国的城镇化发展，提出应该让城镇拥有生命，他认为生长是有生命的城镇唯一的存续方式，有生命的城镇只有社会变迁，没有新旧更替，有生命的城镇只能自然生长，无法强制合并。

在高端对话环节，与会嘉宾围绕“乡村·城镇化·现代化”的话题，对于旅游业在乡村城镇化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具体问题，文化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的角色等方面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进行了探讨。

（据凤凰网摘编，2013年7月19日）

■ 网络名人社会责任论坛在北京举行

8月10日，网络名人社会责任论坛在北京举行，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鲁炜与十多位网络名人座谈交流。

鲁炜提出，希望网络名人承担更多社会责任，自觉维护国家利益，自觉维护公共秩序；网络名人应积极发挥汇聚正能量的作用，自觉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中华民族美德，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出贡献；希望网络名人带头遵守法律和道德规范，努力成为法治和道德的倡导者；积极倡导社会诚信，为社会诚信建设做出贡献；带头维护公民个人合法权益，自觉抵制一切有损他人名誉和利益的行为。

与会网络名人一致认为，网络空间是现实社会的延伸，现实社会的法律和道德规范都应适用于网络空间，任何人都应对自己在网上的言行负责任。

本次论坛现场情况通过微博发出后，引起网民热议。多数网民认为，网络名人影响的人多，承担的责任也更大，更应避免传播不实信息，应为汇聚和传播正能量发挥更大的作用，“大 V”在传播信息时应考虑到要自身需要履行的责任和义务。

（据新华网摘编，2013 年 8 月 10 日）

■ 第二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项目)创建工作启动

8 月 14 日至 17 日，文化部、财政部在北京召开第二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项目)创建工作评审会。来自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 50 位地市领导进京参加评审会，其中包括 13 位市长或市委书记。

与 2011 年首批示范区的创建评审工作相比，今年，各地党委、政府对此项工作更为重视，态度也更为坚决。据介绍，在今年参与申报示范区创建的 50 个单位中，北京市东城区、安徽省安庆市等 13 个申报单位均由党政“一把手”率队参加答辩。此外，今年申报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创建资格的单位数量也再创新高，达到 103 个。参与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项目)创建工作的单位达到 100 多个，几乎占到全国 333 个地级市的 1/3；如果加上第一批参与创建的地级市，参与示范区(项目)创建的单位超过了全国地级市总数的一半，体现了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项目)创建工作覆盖面广、参与度高的特点。

（据文化部网站摘编，2013 年 8 月 22 日）

■ 国家重点文物保护专项资金将向非国有单位敞开

日前，财政部、国家文物局颁布《国家重点文物保护专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明确该专项资金的补助范围将打破国有与非国有以及行政隶属关系界限。这意味着曾被排除在外的非国有全国重点文保单位也将获得补助。

对比 2001 年颁布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专项补助经费使用管理办法》，专项经费由原来的只适用于“文物管理部门管理和使用的文物保护单位，文物管理部门所属的博物馆、纪念馆和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文物单位”，扩大到所有经国务院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所有国有文物收藏单位馆藏一、二、三级珍贵文物，基本涵盖了我国文物保护工作的重点。其中，对非国有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明确规定“可在其项目完成并经过评估验收后，申请专项资金给予适当补助”。

据介绍，此次颁布的新管理办法共计 6 章，包括总则、补助范围和支出内容、申报与审批、资金管理、监督检查和附则等。财政部数据显示，2013 年中央财政预算安排国家重点文物保护专项补助资金 70 亿元，比 2012 年增加 5 亿元。

（据新华网摘编，2013 年 7 月 29 日）

■ 首次全国性“中国公民政治文化”调查结果揭晓

8 月 9 日，由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与中国社科院调查与数据信息中心于 2012 年下

半年开始进行的首次全国性“中国公民政治文化”调查结果揭晓，其研究成果在《中国政治参与报告(2013)》中介绍。在体制认同、政党认同、身份认同、文化认同、政策认同、发展认同中，以5分计算，身份认同得分最高(4.19分)，其次是发展认同(3.74分)，第三是政党认同(3.63分)，第四是政策认同(3.59分)，文化认同和体制认同得分较低(均为3.44分)。调查还测试了权利认知、利益认知、公民满意度、政治沟通认知和政治参与行为五个因素对公民政治认同的影响。专家特别提出，民众的政治参与状况不够理想会对各种认同产生消极影响，值得重视。

进一步的分析显示：在体制认同方面，中国公民最关注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三项内容是“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改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改革”和“选举制度改革”；在政党认同方面，中国公民认为中国共产党最应该做的三件事是“坚持反腐败”、“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和“注重政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在身份认同方面，中国公民最看重的身份是“中国人的身份”、“中国公民的身份”和“城市人或农村人身份”；在文化认同方面，中国公民最认可的文化发展方向是“发扬光大中国传统文化”、“多种文化融合的中国现代文化”和“注重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在政策认同方面，政策的公平性、民主性和有效性最受关注；在发展认同方面，中国公民最关注和满意的是“经济建设”、“党的建设”和“社会建设”。

（据光明网摘编，2013年8月9日）

3. 媒体聚焦

■ 打击网络谣言，更要反思网络谣言的滋生土壤

编者按：近日，北京公安机关打掉一个蓄意造谣传谣、扰乱网络秩序、非法获取经济利益的网络推手公司，网络红人“秦火火”“立二拆四”等人因涉嫌犯罪被依法刑拘。这一举措在令网民拍手称快之时，也引发了有关人士更加深入的思考与追问：究竟是什么样的环境滋生了网络谣言？谁应对此负责？如何平衡打击谣言与保障网络活力之间的关系？在整治“民谣”的同时，“官谣”是否也应得到相应惩治？

有文章提出，反思滋生网络谣言的土壤，要从现实世界和网络世界两个方面着眼：一方面，网络世界对于谣言制造者和传播者并没有给出清晰的法律界定，让“秦火火”得以用一个谣言来终结另一个谣言；另一方面，现实世界真实信息缺乏透明和公开，也给了网络谣言得以滋生的土壤。有些时候，正是政府部门的出言不当、对事实真相的捂着盖着藏着，把网民逼进了网络谣言的陷阱，让网民很容易被“忽悠”。(据李龙：《有必要反思“秦火火”为何能“火”》，《广州日报》，2013年8月22日)此外，网络谣言背后的商业动机也是不容忽视的，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沈阳认为，“这类互联网中的黑暗产业，刚开始造谣传谣仅仅是吸引关注，称之为个性化需求阶段，当他们尝到了

甜头之后，商业机构往往会参与进来，大规模、有组织地推广，进入产业化运作的阶段。(据《铲除网络大谣须多管齐下》，《人民日报》，2013 年 8 月 23 日) 网络运营商只顾经济利益，忽视监管控制，对于网络大谣的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网络运营商应明确自身法律责任，加强监管力度，完善内部监管机制。(据张凯、解安：《“V”言耸听背后：运营商为利益放任网络大谣发生》，人民网，2013 年 9 月 4 日) 也有人建议，在信息的取舍与判断中，广大网民不要盲从，而应坚守住理性思考，以防陷入“习惯性质疑的泥淖无法自拔”。(据沈德良等：《“微时代”，守住一份理性》，《湖南日报》，2013 年 8 月 30 日)

也有文章指出，打击和治理网络谣言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能肃清网络风气，用得不好也会产生负面影响。一方面，在“无拘无束”的网络世界里，谣言“满天飞”，广大网友深受其害，也深恶痛绝，公安机关大力“打谣”可谓顺应民意，扫清了大量“牛鬼蛇神”，彰显了“正能量”。而另一方面，“打谣”行动需要张弛有度，如果用力过猛“打过了头”，就会造成“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境况；如果人人都“心生畏惧”而不敢“说真话”、“吐真言”，网络就失去了“生命力”。因此，在此过程中，我们应坚持适度原则，做到刚柔并济。(据《“打谣”勿过头，须得“刚柔并济”》，《人民网》，2013 年 9 月 2 日) 此外，我们还需要谨慎处理打击网络谣言与保护言论自由之间的关系，打击网络造谣行为需要公开透明，需要依法依规，无限上纲上线或刻意“升级”处理也会产生“负能量”——不仅可能使一些网民惶惶不安、噤若寒蝉，也可能会让一些部门在利益驱使下给喊冤、传达民意的网络行为扣上违法犯罪的帽子。(据徐战方：《打击网络造谣不是限制言论自由》，《东方今报》，2013 年 8 月 22 日)

还有文章提出，在打击网络“民谣”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对“官谣”听之任之。如果说网络“民谣”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那么“官谣”不仅混淆视听，而且会对权力部门的公信力造成巨大的危害。然而，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官谣”的制造与发布者，像秦火火们一样，付出犯罪的成本，这也是此次打击网络谣言留给社会的缺憾。净化网络势在必行，但净化官方发布的虚假信息，更应作为一项民心工程、法治工程来看待，做到苍蝇老虎一起打，官谣民谣一起治。既要打击官谣的发布者，更要打击其背后的授意者。既要问责，更要治罪。(据刘雪松：《官谣一旦成风，“谣翻中国”便不只是笑话》，《钱江晚报》，2013 年 8 月 30 日) 因此，当务之急，是要拿出比抓民间“谣言”更大的力度来惩治“官谣”。重治“民谣”，轻治“官谣”，既不公平，也难以服众，更在客观上对官员撒谎形成了纵容。(据《治理“官谣”同样要施重典》，《晶报》，2013 年 9 月 2 日)

■ 冀宝斋折射出民间博物馆乱象与困境

编者按：近日，河北冀州的一座名为“冀宝斋”的博物馆被媒体曝光，该博物馆的藏品千奇百怪，有许多悖于常识的“文物怪胎”，堪称“低仿假货集中营”。然而，就是

这样一座充斥着赝品的博物馆竟然获得了诸多官方身份，如“河北省省级科普基地”，这不能不让人为之震惊。在舆论压力下，该博物馆已经关闭，但是，这一事件引出的问题——如何办好民间博物馆——却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深刻的反思。

有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像“冀宝斋”这样的博物馆能够打着官方的旗号，名正言顺地向公众散布文化垃圾，亵渎历史文化，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真正催生这座“奇葩”博物馆的是，资本的私利贪欲与权力的政绩形象。(据单士兵：《“奇葩”博物馆产自权力丑行》，《京华时报》，2013 年 7 月 12 日)也就是说，地方政府扭曲的政绩观是这种现象出现的罪魁祸首。时下，在很多地方政府乃至官员的眼中，所有的文化建设都应该量化为具体的指标。从拍了多少部戏，到建了多少面积的文化场馆，乃至获得了多少个荣誉或奖励，都是可以量化的，也都是看得见的，而他们很少关心真正的文化是什么，民众的文化需求是什么，这些文化投入产出的社会效益如何。文化建设一旦只有一个政绩的目标，那么，一切都变了味。(据《冀宝斋的“传奇”是如何诞生的》，《新京报》，2013 年 7 月 15 日)

在“冀宝斋”的筹建过程中，耐人寻味的是，明明有村民已经集体抵制博物馆的相关经营活动，但是这种声音只能在事后才会被人听到。于是有人质疑：一个村集体，搞出这样的“博物馆”，果真是村民哭着喊着非建不可吗? 这背后的资金账目与决策程序，该不该引入究责体系掘进真相呢? (据邓海建：《“奇葩博物馆”是怎样炼成的?》，《北京青年报》，2013 年 7 月 15 日)针对民办博物馆当前的种种乱象和困境，各界人士提出了许多可供参考的建议。有人认为，在博物馆自我宣传外，还要建立起来自官方、专家知识层的评价体系。这三种评价体系共同构成与少数博物馆自说自话相对应的“话语对冲机制”。这种对冲是藏品真伪、文物价值的评判平台，也是扶助民办博物馆走向正轨的助推机制。(据尉超伟：《“奇葩”博物馆不要辱没民众智商》，《中国文化报》，2013 年 7 月 17 日)

有文章提出，民办博物馆的存在确实有利于文化发展，有数据显示，我国民办企业已成为民间收藏的主力军，到 2011 年底，全国登记注册的民办博物馆有 535 家，到 2020 年，民办博物馆的数量将占博物馆总量的 20%。但资金的匮乏、筹资渠道来源的单一以及法律地位的模糊成为限制民办博物馆的最大瓶颈。因此，在“冀宝斋”事件后，我们也不能对民办博物馆一棒子打死。我们要规范民办博物馆的准入制度，完善民办博物馆的法律保障体系，除了依靠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和完善现有的行政规范并加强管理外，还应该通过立法机构制定一部规范全国博物馆行业和博物馆业务活动的博物馆法，以规范、推动我国现阶段文博事业的发展。(据王鲁坤：《冀宝斋博物馆闭馆整顿民办博物馆要规范更要支持》，《检查日报》，2013 年 7 月 19 日)

4. 尖峰观点

■ 彭真怀：要真正理解新型城镇化的切入点

中央提出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明确要求“趋利避害”、“因势利导”。这两个要求是理解新型城镇化的切入点，把什么是利、什么是害首先搞清楚了，才有可能顺势而为，有针对性地形成包括金融在内的各种政策支撑体系，并通过局部试点把事情先干起来，循序渐进，真正落实释放改革红利的战略意图。

新型城镇化的“城”指的是县城(城关镇)，“镇”指的是小城镇(建制乡镇)。这是“新型”两个字的真实含义，具有特别明确的政策导向性。县城和小城镇所依托的县域，占全国总面积的94%以上，占全国总人口的70%以上。这个数据反映的基本国情，实际上指明了新型城镇化的主攻方向，就是要给县城和小城镇30年的培育期，因地制宜，发展具有禀赋优势的新兴产业和特色经济，从国家战略角度实现产业、人口和就业结构的调整与变迁。县城和小城镇是国家政权的神经末梢，存在各种基层微观事件。抓住这个关节点，近期可以拉动经济增长，远期抓住了建党10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国100年建成现代化国家的大方向。

1983年，中央提出地市州党政机关机构改革，要求试行地、市合并。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很多城市采用行政手段，集中优质资源盲目进行外延式扩张，在老城区之外人为地搞一个新城区，拉大了原有的城乡差距不说，而且在城市内部又造成了新的二元结构。当下有必要采取区别对待的办法，从过去“三分管、七分建”扭转为“七分管、三分建”，重点改造这些城市的老城区、城中村和棚户区，稳妥化解多年形成的债务风险。要用铁石心肠治乱，彻底改变地级以上城市粗放式的规模扩张，用10到20年的时间提升城市的生活品质和幸福指数。

新型城镇化一是趋利(在空间上重点规划发展县城和小城镇)，二是避害(解决地级以上城市的历史遗留问题)。其中，当务之急是对旧型城镇化进行全面反思，采取不破不立、边破边立和先破后立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新型城镇化牵扯到很多基础性改革议题，其中任何一项改革，单项推进很难突出重围，全面铺开也存在失控风险。建议兵分两路，分别进行局部封闭试点：一路是按1/10的比例，从全国287个地级以上城市选30个，目标是处置旧型城镇化遗留的老城区、城中村和棚户区；另一路是按1/100的比例，从全国2，850多个县(市)选30个，目标是盘活三农全局(农民生活现代化、农业生产企业化和农村生态田园化)、引领四化同步(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和工业化)、统揽五位一体(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生态建设和社会建设)。

试点前应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掌握真实的决策依据，试点方案宜粗不宜细，在实践中不断修订完善。在起步阶段，不宜进行顶层设计，不宜制定中长期规划，不宜一

下子全面铺开。可以挑选一批政治上可靠的民营企业家，选择 30 个具有代表性的县(市)封闭试点，放开所有的政策空间，大胆试、大胆闯。几位企业家在一个县(市)连续干 3 到 5 年，把县城建成 20 万人左右的宜居小城市，每个县(市)再建 3 到 5 个 10 万人的生态美丽小镇。

如果能解决县城和小城镇 80% 左右的饮水安全、道路硬化、垃圾处理和生活能源自给，就可以在大面积房地产泡沫之后再次恢复增长，把我国经济社会带入一个内生型的增长轨道。新型城镇化是一个蕴含智慧和路径的安国之策，标志着要把县城和小城镇作为治国理政的重点，特别要把地级以上城市的教育、医疗和文化等公共资源有序分散转移，从而保证县城和小城镇有就业支撑，有服务保障，有承载力量。

由于对新型城镇化的理解出现偏差，一些地方政府正在酝酿把县改为市或设为区，心情还很迫切。针对这种情况，可以考虑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一次新型城镇化大调研。通过调查研究凝聚共识，有利于提高各级领导的认识能力、判断能力和工作能力，保证新型城镇化在大方向上不发生偏差，在大原则上不引起争议。在方向不明的时候，应该先停下来辨明方向，切不可出手过快，用力过猛。

从进城成本分析，通过政策引导实现农民工就地进入县城和小城镇，在户籍、医疗、教育和就业等生活生产方式上享受与城市居民均等的待遇，是一个很现实的路径选择，而不是全部涌进地级以上城市。用新型城镇化形成新的治国理念，还需要对农民保持应有的尊重，对农业保持应有的敬畏，对农村保持应有的清醒。听一听农民最盼、最急、最忧和最怨的肺腑之言，有利于消除和减少影响全局的不和谐因素。

（据彭真怀：《要真正理解新型城镇化的切入点》，凤凰网，2013 年 6 月 24 日）

■ 伍江：中国城镇化的问题与解决之途

我国城镇化发展已经进入全面城镇化时期，如此大规模的快速城镇化，带来城市经济、社会的巨大变革，人民的整个生活空间、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以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都会发生很大变化，同时因为城市有大量的建设活动、生产行为、生活需求和消费，必然会对环境和资源产生巨大冲击。所以，城镇化带来的问题也自然成为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

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我国城镇化发展存在着自身的特点与问题。首先，当代中国城镇化具有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城市建设，成为我们国家最大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引擎。第二，我们的城镇化与工业化不完全是一回事。中国的工业化直接导致了非农化，却没有带来完全的城市化。这种不完全的城市化，一方面表现为大量农业用地转化为工业用地，另一方面表现为工业区游离在城市建设用地管理制度之外。第三，虽然全国都处于快速城镇化、工业化过程中，但是区域发展水平差异非常大。另外，我们城市本身的文化特色越来越趋同——不论经济改革发展模式有何不同，城市建设管理模式和建设面貌却越来越相同了。第四，快速的城市建设和城镇化导致城市土地紧缺；但另一方面，土

地浪费现象又很严重。第五，由于城镇化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城镇化的水平又有高低之分，因此，即便是在同一个城市中，也有高度的城镇化和不太高度的城镇化之分。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虽然实现了城镇化，但城镇化的程度水平却非常低下。第六，中国特殊的行政区划体制，对城镇化的进程也有巨大的影响，城镇化虽然可以通过行政级别的提升直接实现，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当代城镇化中的问题应如何解决？第一，应该提出土地节约利用、城市发展高密度的战略。第二，由于中国区域发展不均衡，所以不能只有一种模式的城镇化，必须协调好中、小、大城市同步、均衡的发展。第三，不同城市发展的空间战略会带来不同的结果。应根据城市特点制定合理高效的统筹规划，而不应照搬现成模式。第四，在保护地域既有的文化特色的基础上，创造新的文化特色。第五，留足基础设施所必须的空间，为城市更高效、更好的发展奠定基础。第六，优先发展公共交通，这不仅仅是为了照顾城市底层居民的一个民生工程，一个舒适的公共交通体系更关系到全社会每一个成员的利益。第七，更系统化的城市发展，把城市放在城市群里去考虑。所有这一切，最终取决于规划——规划是城市长远利益的体现。因此，规划应该引导城市的发展，并成为控制城市发展的依据。

（据伍江：《关注城市的未来》，《文汇报》2013 年 8 月 26 日）

■ 赵柔柔：糗文化中的日常生活

2012 年年底，低成本喜剧电影《泰囧》以逾 12 亿的票房收人吸引了无数的目光，各界对该片褒贬不一。作为一部类型电影，《泰囧》并没有太多值得赞许的独创性。然而，当我们将它放置在本土流行文化的脉络中时，会发现它的票房成功恰好激活了一类再现形式：不管是“低俗”的指责，还是“接地气”的褒扬，都说明了其带有的一种以喜剧形式再现零碎、无奈的小人物日常生活的尝试。

实际上，讲述/观看片段化的日常生活这种形式对于今日的网络文化来说并不陌生，“糗事百科”等网站即是典型。与一般性质的笑话网站不同，它们的宗旨是分享生活中可笑而无奈的零碎经验。创办于 2005 年的“糗事百科”并未随着新的相似平台的出现而萎缩，相反，它不仅通过网站广告获得了越来越高的经济收益，同时也推出了适合各类手机平台的应用，并搭载于微博等介质之上，进一步扩大了影响。

《泰囧》的高票房收入和“糗事百科”的广泛受众，这两次商业运营的成功并不能仅仅被放在“媚俗”或者是“现实主义”等维度上考量，更值得思考的是它们同时彰显了一个难以被处理、被理论化的问题，即个人化、碎片化的日常生活和个体经验进入表征层面的方式，以及这样一种方式携带着怎样的意识形态诉求。近年来网络互动平台的日益成熟与流行，恰恰打开了一种令日常生活得以再现的特殊路径，同时也为研究“日常生活”对于当代社会的功能指出了一条可能的思路。

被“糗友”津津乐道的更多是生活中遇到的最平常的尴尬与意外，以及对此抱有的

无奈、自嘲的态度。“糗事”或者“囧”字的流行，恰是因为它们传神地表述了一种虽然诸事不顺却并不绝望的情境。这类情境看起来十分戏剧化、超出想象甚至夸张得不可理喻，然而却非常真实地契合着一类人的生存状态，它的大受欢迎显影出一个存在于当下社会当中的、大部分时候处于无声状态的主体位置。在某种程度上，“糗事百科”的引人之处或许就在于它令这些生活中很难被讲述的无奈琐事得以被观看/暴露，从而消解了其所带来的不稳定因素。

值得关注的是，在最近几年的网络文化中，“糗百”与“泰囧”所提供的主体位置并不陌生，“屌丝”所指代的人群便与此相似。随着“屌丝”成为网络热词，它渐渐褪去了其本身的具体所指，转而取代了此前风行一时的“底层”“草根”等，变成一种虽远远不及“高富帅”类的成功人士、却有着自己生活哲理的普通人的自嘲性自指。他们一方面对社会的不公正与生活中的不如意颇为不满，另一方面却因自知无力改变现实状态而拒绝饮下成功故事的心灵鸡汤，相反更愿意以自我解嘲的方式面对，并化解掉日常生活中的诸多无奈，以便能安于现实中不上不下的尴尬位置。由是观之，糗文化所显影的或许恰是社会阶层的分化与固化的现实。

（据赵柔柔：《糗文化中的日常生活》，《中国图书评论》，2013 年第 6 期）

■ 郭存海：巴西中产阶级“革命”的逻辑

无论是国土面积还是经济总量，巴西都无可争议地堪称拉美第一，不仅如此，巴西还是近十年来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新兴经济体。然而，作为“金砖国家”之一，巴西这个最有希望的崛起中的大国正遭遇“成长的烦恼”。今年6 月初，圣保罗发生不成规模的示威游行，这场抗议活动愈演愈烈，最后发展成自 1992 年以来规模最大的全国性抗议浪潮。这背后潜藏着过去几十年间，特别是近十年来，巴西经济和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政策瓶颈。本次抗议活动的主要特征是：抗议主体是中产阶级，特别是新兴中产阶级；抗议活动没有领导、没有组织，抗议者不代表任何政党、政治集团和政治家，也不愿被任何政党所代表，有去意识形态化和反传统政治的倾向；抗议活动的总体利益诉求高度一致，即改善和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

巴西现在发生大规模抗议的主要原因在于，10 余年来巴西社会发生结构性转变，但巴西政府明显未能与时俱进，没有认识到社会发展中的这种新变化及其伴随的挑战。随着经济和社会环境的持续改善，贫困和赤贫人口的持续减少，中产阶级的不断扩大，中产阶级的快速扩张深刻地改变了巴西的社会结构。巴西社会结构也不再是金字塔形，而是一个近菱形。社会结构的转变意味着社会需求也在发生改变。在巴西，尽管穷人仍占有一定比例，但社会总需求显然已不再简单地统归于解决温饱、有学上、有病可医等最基本的生活和服务需求，而是不断提出的更高的新要求，比如改善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遗憾的是，巴西政府未能及时捕捉这种需求的变化或者感知迟滞，结果导致相应政策的缺位，埋下了不满的种子。根据亨廷顿的观念，经济增长往往会带来一个悖论：

人们生活越好，期望和要求就越多，也越容易不满。

经济环境的改善及其带来的社会结构变迁也冲击了社会价值观念，这一点首先反映在象征巴西未来的青年群体上。有调查显示，巴西青年总体上认为自己的话语权较弱，其声音没有被听取，有 75% 的受调查者不信任政府官员，59% 的人不信任司法机构。正是对公共服务质量的不满，导致只有 2% 的巴西青年相信政府，而与此同时却有高达 53% 的青年选择相信自己，认为一切改变要靠自己。在信息时代，互联网无疑成为公众表达不满情绪的首选渠道，而借助于信息共享的动态性，网上的不满也更容易在相互催化下演变成网下的街头行动。

此次巴西的示威活动同之前阿拉伯国家的抗议活动存在着显著的区别，巴西的抗议并不针对任何一个特定的领导人，亦非针对整个政治体制，而是谋求“更好的生活质量”。巴西中产阶级的目标并非要推翻整个制度，而旨在改善决策质量，增强政策的可控性、透明性和可参与性。它不是一种体制更迭之争，而是一种政策优先顺序的排位战。根据政府的定义，巴西中产阶级月收入大约只有 600—2000 美元，仍存在返贫的可能性。他们对公共服务的依赖度仍然较高，但同时面对质量不佳的公共服务又心有不甘、不满。所以，当前巴西社会矛盾的根源在于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及其不断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同落后的政府服务能力之间的矛盾。巴西的示威游行之所以现在发生，尽管原因不一，但其首要因素当是巴西经济增速在 2012 年的剧烈下滑。对新兴中产阶级而言，经济增速锐减是难以承受的，因为持续改善生活的期望是不断上升的，预期骤然下挫，无疑会大大降低对政府效率和低质量服务的容忍度。

巴西中产阶级“革命”的逻辑对中国具有强烈的警示作用。中产阶级作为中国社会的新兴阶层已占总人口的约三分之一，这一新兴群体急欲在增强公共服务质量、政策透明性，以及责任制政府诸方面拥有和提高话语权，同时不断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而随着经济增幅在过去两年间逐步放缓和每年新增大量的大学毕业生，政府如何在变化的形势下满足新兴中产阶级及其后备军的需求，无疑将是事关中国社会稳定的一大挑战。

（据郭存海：《巴西中产阶级“革命”的逻辑》，《东方早报》，2013 年 7 月 23 日）

■ 孙照红：“城市精神”热现象的透视与反思

据统计，截至目前，除港澳台外，全国 4 个直辖市全都有了自己的城市精神表述语；在所有省会城市中，除拉萨外，其他城市也都已经开展了提炼城市精神的活动；不少中小城市甚至个别城镇也掀起了大大小小的类似活动。可以说，目前全国上下兴起了一场“城市精神”热。从某种意义上讲，征集、提炼城市精神活动的出现，表明城市发展观的转变，昭示着城市文明的进步与升级。然而，据半月谈网络问卷的调查，对“您认为所在城市是否具备个性化的城市精神”这一问题的回答，选择“存在，已经提炼出来”的仅有 19%。可见，一方面，各地对“营造城市精神”的需求确实很高，但另一方面，各地公布的城市精神表述语却与群众的期盼差距甚远。

调查显示，各地提炼出的城市精神共性有余而个性不足。如“创新”“开放”“包容”“和谐”等词出现的频率非常高。各地城市精神表述语出现大量雷同的现象，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我国城市“千城一面”的现状。有调查表明，只有近两成的受访者对当前的城市精神表述语表示认可。公众不满的原因就在于提炼出的城市精神个性不足、缺乏新意、不具有针对性。不难想象，在建筑风格、布局规划、发展模式都趋同和城市精神文化空虚、匮乏的情况下，要想单纯通过提炼城市精神这种短期、运动式的行为彰显城市个性是很难做到的。要想打好“城市精神”这张牌，仍需深挖城市的历史文化传统，考察城市的地域特点，了解城市的社会生活习俗，进而提炼出具有城市特质的城市精神。

在征集、评选城市精神的过程中，政府部门、市民、专家、新闻媒介都是参与的主体，其中，市民在这一过程中应该起决定性作用。城市精神只有被广大市民认同并内化为自身的行为习惯和生活习惯，凝聚为市民的共识，融入市民的生活，才能产生出城市精神所应该产生的正能量。而要在最大程度上得到市民的共识，必须充分调动起市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市民的聪明才智。但是，在不少城市，生于斯长于斯、真正了解市情的普通市民却成了只是看看热闹的“旁观者”，政府或专家成了全权代表，这样出炉的城市精神怎么可能得到市民的认同?

“城市精神”热的出现也反映出一些城市的文化浮躁和功利心理，盲目的模仿跟风就是典型表现。在这样“急躁”“功利”的背景下出炉的城市精神要么是有名无实的、空洞的标语口号，要么是大同小异、似是而非的“复制品”。在政绩冲动和功利驱使下的盲目模仿跟风恰恰是文化激进、文化浮躁的行为，只能制造文化泡沫。“虚热”很快过去，城市的预期发展目标不仅不能达到，反而会因此受到扰乱甚至阻滞。

城市精神重在实践，贵在落实。“官方发布”只是培育城市精神的第一步，后续的培育和践行才是更为重要的。从根本上说，城市精神属于文化范畴，培育、践行城市精神，必须遵循文化的发展特点和规律。城市精神的培育和践行是一个漫长的、系统而又复杂的工程，不是“一评了之”，也不是大张旗鼓地张贴标语、高调地宣传空洞的口号。只有通过具体的实践和扎扎实实的工作，使城市精神“从云端飘落大地”，才能真正被市民接受从而转化为比较稳定的行为导向。

（据孙照红：《“城市精神”热现象的透视与反思》，《北京社会科学》，2013 年第 3 期）

■ 李晓灵、王晓梅：当代中国电影中的北京形象

当代中国电影中的北京是一个极具历史性的媒介建构景观，也是镌刻着全球化烙印的特殊文化想象，当它将空间表达和身体生产互为映照时，北京城市形象藉此表现为传统古都、现代迷城和世界新城。

在当代中国电影中，“乡土中国”是古都北京最为浓郁的文化底色，其空间想象以“四合院”和“胡同”为表意主体，这在《骆驼祥子》、《城南旧事》、《霸王别姬》等影片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除此之外，故宫、天安门、长城等皇家建筑，则显示出北京所承

载的厚重历史，这主要体现在《垂帘听政》、《火烧圆明园》、《两宫皇太后》等清宫影片中。在此，北京是一个阴谋与权利的角斗场，血腥与残酷的斗争参杂着复杂的民族情感，成为挥之不去的历史记忆。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改革开放的深入使得北京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漩涡中心。在当代中国电影中，“北京”由此成为一座悬浮于现代化风暴中的迷惘之城。城市转型的困惑和青年成长的痛苦，是当代电影中现代化北京的主要特征。这点最鲜明的体现为城市传统空间的“消失”与新空间符号的建构，例如《我的九月》、《北京，你早!》、《找乐》、《开往春天的地铁》等。在迷城北京的城市空间想象之下，关于北京的身体表达隐含着欲望、焦虑、迷失，表达了现代化北京特定的文化想象，如《北京杂种》、《阳光灿烂的日子》、《十七岁的单车》等影片都表达了“成长”的欲望冲动和身体迷失，这似乎也突显了北京城市现代化“成长”的文化焦虑与身份迷惘。

进入 21 世纪以后，全球化浪潮席卷而来，其中，“入世”和“奥运会”成为北京全球性想象的典型代表。中国当代电影中，全球化中的北京是一个本土关照和跨国想象交织的“世界新城”。在全球/本土化中的北京，空间表达和身体生产都指向了近乎疯狂的全球想象和巨大的身份焦虑，“世界新城”的幻影美丽而纠结，充满矛盾，典型的代表有《世界》、《大腕》、《不见不散》等。

（据李晓灵、王晓梅：《历史性建构和全球化想象》，《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3 年第 2 期）

■ 吴卫华：好莱坞电影的中国故事和中国形象

中国题材电影是好莱坞电影工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好莱坞的中国故事不仅数量可观，而且体裁多样，对中国形象的过激传播已然产生了不容小觑的影响。

好莱坞电影素来恪守“政治正确”的传统，具体到中国形象塑造上，从《龙年》、《红色角落》、《大班》到《赤色黎明》等，好莱坞的中国故事总是与中美之间现实关系的结构变化相联系，充斥着美国至上意识或“冷战”思维惯性。而鲜明的主流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常常使好莱坞将中国表述为没有民主人权、没有自由的“黑暗”国度。虽然蓄意丑化中国并不一定是好莱坞的一致动机，但是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误读以及西方数百年来建构出的中国形象的长期浸润，共同形成了好莱坞影片中的中国的刻板形象。

虽然从表面上看，好莱坞电影中的中国形象似乎总是在肯定和否定两极之间摇摆，但从更深层次来看，好莱坞在中国形象表现上却更多呈现出漫画化、妖魔化和丑化等负面倾向，这其中充满着种族、性别与政治层面的傲慢与偏见。梳理好莱坞的中国形象史，我们发现，尽管好莱坞的中国形象在各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风格，但精神上愚昧、道德上堕落、政治上专制和历史进程的停滞等，几乎一直是好莱坞电影关于中国想象的典型话语和议程设置。长此以往，便形成了某些人意识深处的丑陋中国形象。

除《尼克松》、《中国盒子》这种直接宣传反华意识形态的电影之外，好莱坞更多的是以娱乐为幌子和障眼法，将有关中国形象的议程设置巧妙地具体化或简化为一个个似

乎是不经意的涉嫌辱华镜头或桥段，把主流意识形态的反华意识与好玩刺激的娱乐形式紧紧地捆在一起，《阿甘正传》与《蝙蝠侠前传》也许能够说明这个问题。诚然，一部好莱坞电影中某个情节、片段涉嫌对中国的冷嘲热讽不足以将之与辱华划上等号，但当这些碎片被连缀起来，就会渐渐地显现为对中国形象的总体感受和印象，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在观众心中建构出恶劣的中国形象。这将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和传播造成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

负面的中国形象之所以在好莱坞不时上演，还与中国国内逆向种族主义及看客文化的盛行不无关系。逆向种族主义是指一种针对自身的种族主义，它宣扬排内主义，兜售自轻自贱的哲学，对中国文明持否定和批判的倾向。当逆向种族主义思潮蔓延时，在看待好莱坞电影的中国形象问题上必然使传统的看客文化故态复萌。由于电影对影响受众意识有着特殊的作用，因此，重视规避好莱坞中国形象传播中的“蝴蝶效应”，警惕逆向种族主义与看客心态，理应成为当下应对好莱坞电影冲击的现实选择。

（据吴卫华：《审视与反思：好莱坞电影的中国故事和中国形象》，《江汉论坛》，2013 年第 5 期）

5. 机构动态

■ 上海交通大学等举办“新媒体与社会发展”全球论坛

7 月 18 日，第三届“新媒体与社会发展”全球论坛暨中美“新媒体与社会发展”双边研讨会在上海召开。此次会议由上海交通大学新媒体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上海交通大学舆情研究实验室、上海发展战略研究所谢耘耕工作室、全美中国研究联合会、美国杜克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联合举办。国内外专家学者围绕着“新媒体影响力在社会各层面凸显”与“大数据提供反观事物的新视角”的议题进行了发言与对话。

（据中国社会科学网，2013 年 7 月 30 日）

■ 中国传媒大学承办“大数据时代的媒介文明与社会责任”论坛

7 月 19 日，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战略与发展研究中心承办的“大数据时代的媒介文明与社会责任”论坛在贵阳举行。本次论坛围绕大数据技术给媒介带来的变革与变化、文明形态的变更以及由此带来的媒介社会责任等方面的话题展开讨论。全国政协外事委副主任王国庆，全国政协常委、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刘长乐，贵州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贵州广播电视台台长白芳芹，新闻集团全球副总裁高群耀等来自政府、学界、业界的 10 余名嘉宾出席会议并发言。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胡正荣主持论坛。

（据中国传媒大学网站，2013 年 7 月 29 日）

■ 复旦大学举办“新时期国家—社会关系：中国经验与国际比较”研讨会

6 月 29 日—30 日，由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复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办，福特基金会资助的“新时期国家—社会关系：中国经验与国际比较”学术研讨会在复旦

大学举行。

本次会议共邀请60余位国内外高校和科研机构专家学者参加，围绕“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的理论思考”、“转型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重构”、“新时期政党、国家与社会关系”、“社会改革与治理的制度建构”、“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理论和实践课题”、“中国治理：国际视野”、“国家与社会关系：国际比较”七个主题展开热烈而深入的讨论。

（据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网站，2013年7月15日）

■ 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与中国艺术研究院建立合作

7月22日，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公使衔文化参赞兼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主任张中华与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牛根富在莫斯科共同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与中国艺术研究院正式结成长期、全面的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艺术中国·文化中国·和谐中国”形象。

根据协议内容，中国艺术研究院将派遣各领域专家学者赴俄，在文化中心举办专题讲座；不定期在文化中心举办艺术类展览；定期向文化中心寄送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相关刊物。文化中心为中国艺术研究院预留专门展示区域，长期摆放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宣传资料；发挥纽带作用，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与俄各相关艺术机构开展合作牵线搭桥；邀请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专家学者赴俄参加学术论坛、圆桌会议等。

（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网站，2013年7月23日）

6. 海外视野

■ 英国为什么能够成功出口戏剧

英国戏剧能够成功出口，首先要归功于英国剧院的补贴制度，由于英国国家艺术委员会补贴数百个文艺团体，使得演出票价低廉，因而推动了需求，促进了供给质量的优化。票价贵造成了戏剧与观众之间的隔膜，这种隔膜，尤其是与有欣赏力的文艺爱好者之间的隔膜，很不利于戏剧水平的提高。高素质观众的互动反馈，是改进戏剧质量的重要资源。戏剧需要在国内有欣赏力的观众中先行磨练，通过观众的互动反馈来改进和竞争。而目前我国戏剧业中存在的这种隔膜，则阻碍了这种互动反馈。

英国采取的补贴票价的措施要优于补贴剧团，补贴票价可以刺激大众的戏剧消费，那些被高票价压抑的文化消费需求，会被释放出来，而这种高雅文艺的消费，是对社会未来发展有利的，它能使社会中高素质的人群增加；当高雅文艺消费被刺激增加之后，可以拉动高雅文艺产业的就业，这种服务业的增加，有利于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补贴票价还可以促进高雅文艺团体之间的良性竞争，使高雅文艺产业发展出水平更高的产品。

其次，剧院聚集优于分散，伦敦有识别度很高的剧院文化区，在伦敦西区有几十个剧院，上演着不同的剧目。这种布局裨益颇多：第一，便利观众的消费需求，可以促进

消费；第二，有利于制作者之间的竞争，也更便于近距离沟通；第三，有利于拉动聚集区内的综合文化消费，如茶室、咖啡厅、书店书屋、餐馆等；第四，聚集区可以为观众、制作者、剧评人等提供交流互动的空间，这种互动既有利于高雅文化的普及，也有利于高雅文化作品水平的提高。

相比较而言，北京的剧院分布则非常分散。北京早有雄心要发展成为文化大都市，为什么不搞剧院聚集区呢？据一位负责北京城市规划的人士解释，剧院分散是为了便于住在不同地区的人就近看戏。这种解释忽略了戏剧市场的特殊性，剧院不同于电影院，电影可以有许多拷贝，同一电影可以在许多影院放映，一个影院也可以放映不同的电影，因此观众可以就近去影院观看自己想看的电影。但是，舞台戏剧没有拷贝，一个剧院在一段时间内也只能上演一部戏，如果观众要就近看，就没有了自己的选择；若要选择自己想看的戏，多数不能就近。因此，就近看戏是不太符合戏剧市场现实的。

（据尹伊文：《英国为什么能够成功出口戏剧》，《南方周末》，2013 年 7 月 4 日）

■ 法国：以文化影响力塑造大国形象

近日，法国文化部长菲利佩蒂和外交部长法比尤斯在《费加罗报》发表联合署名文章，共同阐述了法国对外文化政策。之后，法国对外文化合作与行动机构联席会议在里尔召开，探讨新时期对外文化战略，对法国对外文化新政做了更深入的解读。事实表明：文化外交已经成为法国新时期对外文化交往的重点。

首先，法国积极以软实力维护大国地位。在全球化时代，法国作为一个中等规模的国家，能始终在国际事务中扮演大国角色，与其雄厚的文化软实力密不可分。法国的对外文化传播网络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驻外使馆文化处、文化中心或文化院、法语联盟和各种研究中心等遍布世界各国，构成了强大的网络，为传播法国文化、提升法国影响力发挥着巨大作用。据统计，目前，有 6000 余人在法国驻外文化机构任职。长期以来，法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一直超出它的综合国力。近些年，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特别是欧债危机的影响，法国经济持续下滑，失业率攀升，大国形象受损。在这样的背景下，法国政府力图在对外文化方面有所突破，倚重文化软实力重振大国地位。

其次，法国的文化外交路线愈加清晰。第一是坚守“文化例外”的一贯主张，成功地把文化产品排除在一般商品之外，使之享有“文化例外权”。前不久召开的欧盟贸易部长会议上，在法国不遗余力的推动下，欧盟同意在欧美自由贸易谈判中将视听产品排除在外，法国再次捍卫了“文化例外”的原则。事实上，“文化例外”早已成为法国抵制美国“文化霸权”、维护自身利益的有效盾牌和重要政治理念。第二，把推广法语作为法国文化传播的核心和文化外交的第一要务。语言是世界各国文化联系最便捷的纽带，是增强国家软实力的基础。法国要进一步加大向全球推广法语的力度，并向新兴国家倾斜。第三，文化外交路线图还鼓励法国的博物馆“走出去”，在国外举办展览，让世界更加直观形象地了解法国厚重灿烂的历史文化和古典艺术。而在“请进来”方面，则要

重视外国留学生的培养，吸引研究人员来法国进修或从事专业活动，使之成为传播法国文化和推销法国经济的使者。驻外使馆将与归国的外国留学生建立长久联系，构建留法学生资源网。为此，法国将改革和简化签证程序，为相关人员来法提供便利。

然而，法国的文化外交新政也面临着挑战。虽然“文化例外”在欧美自由贸易谈判前夕取得了胜利，欧盟暂且同意把视听产品排除在谈判之外，但内部分歧仍然存在。近几年，受欧债危机的影响，法国经济增长持续放缓，财政负担日益加重，迫使政府不得不削减财政预算，文化经费也相应缩水。如果没有充足的财力支持，法国庞大的对外文化网络的发展必将受阻。此外，法国文化的对外传播长期以来一直受到美国文化的冲击。如今，新兴国家快速崛起，文化投入不断加大，文化影响力越来越大，这也使得法国文化全球传播的竞争对手逐渐增多。

（据梁建生：《法国：以文化影响力塑造大国形象》，《中国文化报》，2013 年 8 月 6 日）

7. 研究院之声

■ 我院学者参加亚洲文化研究协会 2013 年年会

7 月 3 日—5 日，我院首席专家陶东风教授、胡疆锋副教授、盖琪博士应邀赴新加坡国立大学参加了亚洲文化研究协会 2013 年年会，并在会上作了专题报告。

本次会议的总主题为“超越文化产业”（Beyond The Culture Industry），共设一个主会场和 67 个讨论组，共有 240 余名来自世界各国的学者作了主题报告并参与讨论。其中，我院陶东风教授和盖琪博士同在第 48 讨论组，两人分别用英文作了题为《如何理解中国语境中的“娱乐至死”》（How to Talk about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in Chinese Context）和《新权力逻辑下的中国当代影视“红色青春叙事”》（Under the Logic of New Authority：the Chinese Contemporary Red Revolution Youth Narrative in Films and Teleplays）的报告。胡疆锋副教授在第 19 讨论组，用中文作了题为《中国当代网络文学与民族主义》的报告。报告结束后，三人与来自各国的现场听众进行了热烈讨论。

亚洲文化研究协会成立于 2004 年，其成立初衷在于满足亚洲文化研究者日益增长的开拓学术视野、扩大交际范围的需求。2007 年，亚洲文化研究协会在上海召开了首届年会，此后每两年召开一次——2009 年在东京，2011 年在达卡。同年，协会还建立起了注册会员制度并选举出了顾问委员会，由此，亚洲文化研究协会由一个松散的知识分子组织正式转型为一个制度化的国际机构。当前，亚洲文化研究协会的主要宗旨在于为相关学者提供一个分析讨论亚洲核心议题的平台。

■ 我院召开“中国传统文化与社区建设”学术座谈会

7 月 9 日，我院召开“中国传统文化与社区建设”学术座谈会。民进中央副主席、首都师范大学校长、文化研究院院长刘新成，民进中央社会服务部副部长刘文胜，首都师

范大学副校长、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邱运华，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首席专家陶东风作为主办单位代表出席。北京大学教授高丙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萧放，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吕微，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教授龙迪，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王杰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刘正爱，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陈明，金融街社区教育学校、金融街少年宫国学教师韩磊作为特邀嘉宾出席。民进中央社会服务部联络处和研究院相关工作人员参加座谈会。会议由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首席专家陶东风教授主持。

高丙中教授指出，中国有关社区资源的配置仍然是由上而下的，需要反思如何调节资源，以增强共同体的内部认同。研究传统文化对社区建设的作用，需要定义传统文化究竟是在社区之内的还是在社区之外的。此外，还应该克服传统文化仪式化的错误走向，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陈明教授指出，传统文化进社区，既有利于社会稳定，是一种有效的政治治理，也是社区居民的需要。传统文化重视家庭关系，强调具有情感色彩的价值观念，这些元素都有助于现代社会的社区建设。萧放教授指出，现代化使人由熟悉变得陌生，社区建设需要重新使陌生人变得熟悉，一个好的途径就是传统文化。王杰文发言提出，当前的社区缺乏凝聚力和认同感，社区和传统文化是一个互相建构的关系。吕微研究员从现代社区的实际经验出发，阐述了现代社区居民如何通过自治团体维护居民权益、丰富社区文化生活。韩磊则介绍了金融街社区的建设经验。

邱运华教授总结提出，目前讨论的社区是从两个语境来说的。一个是新文化时期村社问题的语境，另一个是 1949 年后的语境，也就是阶级关系的一套话语。改革开放以后，社会问题重新出现，新问题的出现也是文化权力的博弈。问题的指向是想用新的文化价值观协调整个社会出现的问题。无论从民间文化还是文化建设的角度讨论，都有合理性。具体的操作问题，还要靠实践来摸索，需要从实践中总结普遍规律。

在自由讨论阶段，学者就传统文化在自治、互助方面的资源，社区在权力、文化方面的功能意义，“自在的文化”与“可操作的文化”之间的关系，执政者、社区和居民之间的交集，中国与美国社区的比较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本期摘编人：朱楠）

主　　办：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
主　　编：陶东风　邱运华
执行编辑：符　鹏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83 号，100089
电子信箱：wenhuazhanlue@ gmail. com
联系电话：(010)68903449、68903576

(内部参考)